



# 偏見集

梁實秋著

大林文庫 16

大林出版社

# 偏見集

秦寶秋著 大林文庫16

# 偏見集

梁實秋著・大林文庫16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台北郵箱 10032 號・郵政劃撥 15259 號

每冊特價新台幣 25 元

有版權 行政院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0030 號

初版：中華民國 58 年 7 月 15 日

再版：中華民國 59 年 3 月 20 日

## 重印「偏見集」序

民國二十三年，王平陵先生主編中國文藝社叢書，要我把在新月月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過的文字輯爲一冊，作爲叢書之一，於是便把這一本集子交給他印行。那時候的所謂文壇，講「主義」的人很多，並且講的往往不是純粹的文學上的「主義」，常牽涉到政治思想的因素，文學成了武器，是非無從談起。戴了有顏色眼鏡的人們，總以爲自己是絕對的正確，自己是正統的代表，自己是前進的象徵，我遇到這種人只有退避三舍。如果他們的思想是正統的或前進的，我若有所見，只能算是偏見。故名之爲「偏見集」，倒並不是撫謙之意。

此書出版之後，有不少人批評，有兩篇文字給我印象較深，一是李長之先生的批評，發表在天津國聞週報，在大體上是稱許我的，另一是陳望道先生的批評，在上海一個什麼刊物上發表，

全篇是指責我的。現在想想，指責我的已不需要指責，稱許我的已不能再稱許，我則依然故我，「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事隔三十年，是是非非，聽憑大家處斷。

五三、五、廿二，臺北。

# 目 錄

重印「偏見集」序	一
文學與革命	一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二三
文人有行	二九
什麼是「詩人的生活」？	三七
論詩的大小長短	四一
文學的嚴重性	四七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	五一
所謂「文藝政策」者	五五
主與奴	六一
資本家與藝術品	六三
紳士	六九

論第三種人	六七
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	七一
科學時代中之文學心理	八七
現代文學論	一〇七
文學與科學	一四三
詩的將來	一五三
文學批評的將來	一五九
文學的永久性	一六七
所謂「題材的積極性」	一七三
古典文學的意義	一七九
古今之爭	一八五
談十四行詩	一九五
一個評詩的標準	一〇三
詩與偉大的詩	一〇五
文學與大衆	一〇七

文學遺產	一一〇九
詩與迷信	一一三
文學的幼稚病	一一五
人性與階級性	一一九
歐化文	一一一

## 文學與革命

文學是什麼，我們已經常常聽說過；革命是什麼，我們不但是聽說過，並且似曾目覩了。文學與革命，二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們平常不大經意的一個問題，而又是我們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尤其是在如今，「革命的文學」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

我先問：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當然天才不是含有絲毫神聖的意味，天才也是基於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爲天才不過是因爲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眼光特別的遠些，理智特別的強些，感覺特別的敏些，一般民衆所不能感覺，所不能透視，所不能思解，所不

能領悟的，天才偏偏的能。所以極自然的，極合理的，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裏，無論是政治的組織或是社會的結合，總該是比較的優秀的分子佔在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常常是如此。比較的優秀分子，佔據公眾生活的中心，如其完全是賴於他的聰明才智以達到這種地位，這便是一個常態的自然的路程。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團體，有這樣的優秀分子領導着統治着，那就是幸福。少數的優秀的天才之任務，即在於根據他的卓越的才智爲團體謀最大之幸福，凡有創造，必是有裨益於一般的民衆，或是使民衆的物質的供養日趨於富足，或是使民衆的精神的培植日趨於豐美。眞的天才永遠不是社會的寄生蟲，而是一般民衆所不能少的引導者。所以在常態的狀況之下，民衆對於藝術的天才是讚美，對於科學的天才是欽佩，對於政治的天才是擁護。

但是人性不是盡善的，處於政治團體或社會組織之領袖地位的人，常常不盡是有領袖資格的人，更不盡是能有創造的天才，往往只是平庸甚至惡劣的份子，因緣着機會的方便或世襲的餘蔭，遂強據了統治者與領袖者的地位。這樣的假的領袖，對於民衆消極的沒有貢獻，積極的或許就有壓迫。眞的天才隱在民衆裏面，到忍無可忍的時機，就要領導着群衆或指示給群衆做反抗的運動。這個反抗運動，便是革命。革命運動的真諦，是在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假的領袖，用積極的精神擁戴眞的領袖。於此我們對於革命有應注意的幾點：

一 革命的運動是在變態的政治生活之下產生出來的；

- 二 革命的目標是要恢復常態的生活；
- 三 革命的精神是反抗的精神，所反抗的是虛偽；
- 四 革命的經過是暫時的變動，不是久遠的狀態；
- 五 革命的爆發，在群衆方面是純粹的感情的；
- 六 革命的組織，應該是有紀律的，應該是尊重天才的；
- 革命的意義既如上述，請進而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 在革命的時期當中，文學是很容易沾染一種特別的色彩。然而我們並不能說，在革命的時期當中，一切的作家必須創作「革命的文學」。何以呢？詩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民間的痛苦，社會的窳敗，政治的黑暗，道德的虛偽，沒有人比文學家更首先的感覺到，更深刻地感覺到。在惡劣的狀態之下生活着的一切民衆，無論其爲富貴貧賤，他們不是沒有知覺，不是不知苦痛，但是他們感覺到了而口裏說不出，即使說得出而亦說得不能中乎藝術的繩墨。惟有文學家，因爲他們的本性和他們的夙養，能够做一切民衆的喉舌，道出各種民間的疾苦，對於現存的生活用各種不同的藝術的方式表現他們對於現狀不滿的態度。情感豐烈的文學家，就會直率的對於時下的虛偽加以攻擊；富於想像的文學家，就會迴想從前的黃金時代而加以詠嘆；樂觀而又耽於幻想的文學家，就要創作他的理想中的樂園；——不過對於現狀不滿是完全一致的。文學家

永遠是民衆的非正式的代表，不自覺的代表民衆的切身的苦痛與快樂，情思與傾向。尤其是在痛苦的時代，文學家所受的刺激格外的親切，所以慘痛的呼聲也就分外的動人。因為文學家是民衆的先知先覺，所以從歷史方面觀察，我們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往往發現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學」，纔是人的心靈中的第一滴的心血，那是最真摯的，最自然的。與其說先有革命後有「革命的文學」，毋寧說是先有「革命的文學」後有革命。實際的革命爆發之後，文學之革命的色彩當然是益發顯明，甚至產出多量的近於雄辯或宣傳的文字。文學家並不表現什麼時代精神，而時代確是反映着文學家的精神。文學家既不能脫離實際的人生而存在，革命的全部的時期中的生活對於文學家亦自然不無首先的適當之刺激，所以我開頭便先承認：在革命的時期當中（包涵着醞釀與爆發的時期），文學是很容易沾染一種特別的色彩。

何以我又說：革命期中，文學家不必就要創造「革命的文學」？在文學上講，「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根本的就不能成立。在文學上，只有「革命時期中的文學」，並無所謂「革命的文學」。站在實際革命者的立場上來觀察，由功利的方面着眼，我們可以說這是「革命的文學」，那是「不革命的文學」，再根據共產黨的理論，還可以引伸的說「不革命的文學」，就是「反革命的文學」。但是就文學論，我們劃分文學的種類派別是根據於最根本的性質與傾向，外在的事實如革命運動復辟運動都不能藉用做衡量文學的標準。並且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

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纔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的關係，是受時代的影響，還是影響到時代，是與革命理論相合，還是為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值不發生關係。因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的標準。所以「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縱然不必說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學的了解上是徒滋紛擾。並且人性的繁複深奧，要有充分的經驗纔能得到相當的認識，在革命的時代不見得人人都有革命的經驗（精神方面情感方面的生命也是經驗），我們決不能強制沒有革命經驗的人寫「革命的文學」。文學的創作經不得絲毫的勉強。含有革命思想的文學是文學，因為它本身是文學，它宣示了一個時期中的苦惱與情思，——然而人生的苦痛也有多少種多少樣，受軍閥壓迫是痛苦，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痛苦，難道生老病死的磨折不是痛苦，難道運命的播弄不是痛苦，難道自己心裏猶豫衝突不是痛苦？怎樣纔該叫做「革命的文學」？

近代德謨克拉西的思想發達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把民衆的地位看得太高。革命似乎是民衆的運動了，其實也是由於一二天才的啓示與指導，有效的革命運動比平時更為需要領袖。所以在革命的過程當中，雖然不可避免的有許多暴動，以及民衆的直接行動，然而真正革命的趨勢，革命的理論，完全要視領袖者為轉移。領袖者的言行，最足以代表民衆的意識。

文學家就是民衆的非正式的代表。此地所謂的代表，並非如代表民意之政治的代表一般，文

學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類的情思，對於民衆並不是負着什麼責任與義務，更不會負着什麼改良生活的擔子。所以文學家的創造並不受着什麼外在的拘束，文學家的心目當中並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爲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文學家永遠不失掉他的獨立。在革命期中的文學家作品，往往隱示着民間的苦痛，諷刺着時代的虛偽，這並不是文學家銜着民衆的論旨，也不是文學家自動的要完成他對於民衆的使命。文學家不接受任誰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內心的命令；文學家沒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內心對於真善美的要求使命。故此在革命期中，在常態期中一樣，文學家不僅僅是群衆的一員，他還是天才，他還是領袖者，他還是不失掉他的個性。

近來的傷感的革命主義者，以及淺薄的人道主義者，對於大多數的民衆有無限制的同情。這無限制的同情往往壓倒了一切的對於文明應有的考慮。有一部分的文學家，也沾染了同樣的無限制的同情，於是大聲疾呼的要求「大多數的文學」。他們覺得民衆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文學天才的人不能視若無睹，應該把鼻涕眼淚堆滿在紙上，爲民衆訴苦呼冤，如此方是「革命的文學」，如此方是「不悖時代精神的文學」。假使這時候有人吟風弄月，有人寫情詩，<sup>多</sup>有人作戀愛的小說，有人談論古代的藝術，「貴族的」，「小資產階級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的罪名便紛至沓來了。因爲什麼？因爲這樣的文學是個人的文學，是少數人的文學，不是大多數

的文學！其實『大多數的文學』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名詞的矛盾，——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躲在亭子間裏的文人，無論是描寫第四階級的苦痛還是第三階級的享福，無論是呼殺喊打還是吟風弄月，到頭來還不是你個人的心理的一面鏡子的反照？你描寫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之一個整個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這樣的作品是偉大了，因為這是全民族的精神的反映；但是你若深刻的描寫失戀的苦痛，春花秋月的感慨，這樣的作品也是偉大了。因為這是全人類的共同的人性的反映。文學所要求的只是真實，忠於人性。凡是「真」的文學，便有普遍的質素，而這普遍的質素怎樣纔能相當的加以確實的認識，便是文學家個人的天才與夙養的問題。所以「真」的作品就是普遍的人性經過個人的滲濾後的產物。什麼「個人的」「少數的」「大多數的」在文學上全然不成問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在文學上沒有實施的餘地。在革命時期中的文學家，和在其他時期中一樣，唯一的修養是在認識人性，唯一的藝術是在怎樣表示這個認識。創作的材料是個人特殊的經驗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沒有關係，只要你寫得深刻，寫得是人性，便是文學。「大多數的文學」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名詞。

從前浪漫運動的文學，比較的注重作者的內心的經驗，刻意於人物的個性的描寫，在當時是一種新的趨向，是一種解放的表示，所以浪漫文學對於革命運動發生密切的關係，浪漫運動根本的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對於過分的禮教紀律條規傳統等等之反動，這種反抗精神若在事實方面政

治或社會的活動裏表現出來，就是革命運動。浪漫運動與革命運動全是對於不合理的壓抑的反抗，同是破壞的，同是重天才，同是因少數人的倡導而發生群衆的激動。所以一般的人，往往就認定浪漫派的文學是革命的文學。我覺得這個比擬是很適當的。但是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尊奉個人主義的，在最近的革命家的眼裏看來，恐怕這不能算是革命的，因為浪漫派的文學不是「大多數的文學」。然而浪漫派的文學，在政治思想方面觀察，永遠是有革命性的。主張所謂「大多數的文學」的人，不但對於文學的了解不正確，對於革命的認識也是一樣的不澈底。無論是文學，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的「大多數」不發生若何關係。

假如在文學裏面，有所謂革命的文學家，大概是有兩個說法，一是浪漫派的文學，一是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學（或大多數的文學）。浪漫派文學之所以富有革命性，是因為它擁護個人的自由，反抗規律的嚴酷，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學」之所以富有革命性，是因為它含有階級爭鬭的意味，反抗資本主義的壓迫。「無產階級的文學」或「大多數的文學」，上文已經說過，是不能成立的名詞，因為文學一概都是人性爲本，絕無階級的分別。第一階級的文學，假如真有這樣的一件東西，無論其爲怎樣的貴族的，我們承認它是文學，其貴族的氣息並不能減少其在藝術上的價值；第四階級的文學，假如真有這樣的一件東西，我們也可以承認它是文學，其平民的氣息却也

不能增高其在藝術上的價值。實在講，文學作品創造出來之後，即不屬於某一階級，亦不屬於某一個人，這是人類共有的珍寶，人人得而欣賞之，人人得而批判之，人人得而領受之，假如人人都有文學的品味與夙養。一件文學作品，如其不能得到無產階級的了解與欣賞，這不必就是因為作品是屬於另一階級或帶有貴族性，這也許就是因為無產階級本身之缺乏鑑賞的能力。鑑賞文學，不是像飲食男女等等根本的本能那樣，不是人人都有的一種能力。真正能鑑賞文學，也是一種很稀有的幸福，這幸福不是某一階級所得壟斷，貧賤階級與富貴階級裏都有少數的有文學品味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鑑賞文學的人。所以就文學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上言，我們看不見階級的界限。至於文學作品之產生，更與階級觀念無關。古代的文學確是有許多不是某一作家的產物，有人疑心這是團體的共同作品。例如歌謠之類，然而這也不是階級的產物，不是把有產者或無產者千百人聚於一堂，你一言我一語拚湊而成。還是團體中富有天才者首先創作，餘衆爲之附和呐喊而已。自從人類的生活脫離了原始的狀態以後，文學上的趨勢是：文學愈來愈有作家的個性之渲染，換言之，文學愈來愈成爲天才的產物，天才的降生，不是經濟勢力或社會地位所能左右的，無產者的階級與有產者的階級一樣的會生出天才，也一樣的會不常生出天才！所以從文學作品之產生言，我們也看不見階級的界限。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文學而有革命的情緒，大概只有反抗的精神這一點。除此以外，文學與革命沒有多少的根本